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文艺复兴时期 de 思想与艺术



[美]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著 邵宏 译

尽管人们常常把“艺术”、“美的艺术”或者“Beaus Arts”只等同于视觉艺术，
然而它们通常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在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

“艺术”一词首先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大艺术。(major arts)。

这五门艺术是近代艺术体系不可分割的核心。

但这个有关五门大艺术的体系，起源于比较近的一个时期，

在18世纪之前还没有明确地定型。

尽管它的许多成分可以追溯到古典、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

东方出版社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文艺复兴时期
的思想与艺术

[美]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著

邵 宏 译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责任校对：吕 飞

整体设计：薛 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 / [美]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著 邵宏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060-3188-2

I.文… II.①克…②邵… III.文艺复兴—文艺思想—思想评论 IV.I10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2828 号

Copyright © 198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0369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

WENYIFUXING SHIQI DE SIXIANG YU YISHU

[美]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著 邵宏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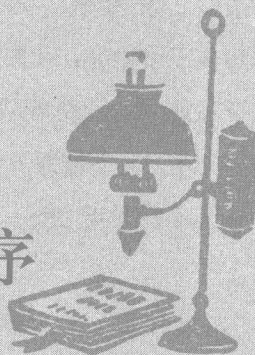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188-2/K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中译者序



曾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的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20世纪以来文艺复兴研究领域里的权威学者。中文读者对他的熟悉, 始于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陶建平译)。此次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 则更全面地向中文读者展示了他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历史和艺术方面的学术成就。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一书, 最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1990年再版时又补充了两篇文章。本书1980年版所收文章来自作者1965年由哈珀火炬丛书 (Harper Torchbook) 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二: 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 (*Renaissance Thought II: Papers on Humanism and the Arts*),

1990年版补充的两篇文章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和“‘创造性’与‘传统’”。此次依据1990年版译出的全书共有十一篇文章，分别归入三个论题：人文主义、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艺术。所收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从1944年到1989年，涵盖了作者学术研究的鼎盛阶段。由此，该书被西方学者誉为“每一位思想史研究者的范本”，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人文主义”这一专题所收的三篇文章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和“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第一篇文章是读者理解作者学术成就的出发点。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将众说纷纭的“文艺复兴时期”大致界定为从1300年到1600年的历史时期。而对“人文主义”的意义，作者不赞成现代流行的观点，将人文主义说成是强调人的价值。作者以文献为基础提出：“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术语是由“人文学者”（Humanist）一词发展而来，它可能源于当时意大利大学生中的一句俚语：人文学者是studia humanitatis（humanities [人文学科]）的教授或学生，有别于法科学者（jurist）。studia humanitatis一词借自古典作家，用来系统强调一些当柿已设置的学科专业所具有的人文和教育价值，该词自15世纪初起便代表着一个教学课程系列：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所有课程都以阅读古典希腊和拉丁著作为基础。正是以这一认识为起点，作者完整地描述了人文学者的职业范围、所涉猎的学科以及与古典传统的联系。

在第二篇以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为主题的文章里作者认为：道德哲学不像哲学的其他学科，它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由此明确了文艺复兴道德思想与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当时讨论道德问题的文献中主要由人文学者撰写，或者由具有人文训练的平信徒撰写，亦即实际上所有讨论道德话题的作者都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由于许多人文学者的职业是教师，因此他们的道德思想强烈地关注于年轻人的教育。人文学者

将古典文化视为他们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主要指南和典范，所以在他们的道德写作中大量引用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引用古代史和神话的事件情节，引用古典哲学家和作家的观点和理论。最后一点，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全文以广泛的文献为背景，阐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思想留给我们的学术传统和文学传统。

作者在这一专题的第三篇文章里考察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作者专门讨论从1350年到1600年的这一时段里，意大利人文主义通过不同途径的有效传播对西欧和中欧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描述传播的几个主要渠道，作者认为，各国本土人文主义的兴起都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有关。通过大量文献，作者向读者描述了这一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普遍的模式似乎是一个适应性改变而非单纯模仿的模式，这点可以解释人文主义在不同国家何以有多少不同的形式。

本书的第二个论题是“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这一专题里，作者收入了三篇文章：“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菲奇诺和蓬波纳齐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对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和亚历山大主义的新研究”。三篇文章的篇幅都不长，却表现出作者对文献的控制、阐述以及个案研究的能力。在第一篇文章里，作者以文献为据说明，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并不是如历史学家之前所认为的，像16世纪的学院那样的一个组织化机构，它只是一个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为中心的圈子，除了菲奇诺的学说没有其他的共同信条，它与美第奇的圈子或者说宫廷联系密切，但不等同于后者。“学园”（Academy）这个名字只是用来模仿柏拉图的学园。这个圈子包括有一些有独立见解和兴趣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思想和兴趣有时与菲奇诺的大相径庭。但柏拉图学园却有效地填补了佛罗伦萨传统文化中哲学研究的空白。

这一论题里的第二篇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44

年。在这篇讨论“菲奇诺和蓬波纳齐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文里，作者通过对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菲奇诺和蓬波纳齐 (Pomponazzi) 的宇宙观研究，来阐述两股潮流如何延续了先前的中世纪传统，与此同时它们又如何用新奇的术语来阐述传统的问题和学说，以及如何代表了两个传统历史中的新阶段，并分析它们各自的功过得失。

“对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和亚历山大主义的新研究”，是这一专题中的第三篇文章。在这篇只有五千多字的文章里，针对传统学术中所谓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威罗伊主义 (Averroism) 和亚历山大主义 (Alexanderism)，即被称作“帕多瓦学派” (the school of Padua) 的观点，作者依据新发现的文献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哲学史是基于“科学和经验的证据”，就哲学史而言，它由文本和文献证据所构成。一种历史看法只有能得到此类证据的支持才有效。作者提出：从今以后不谈“帕多瓦的阿威罗伊主义”，而是谈意大利世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样做会更合适一些；要承认帕多瓦在之后的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也要给博洛尼亚和其他大学应有的名分。

本书的第三个专题“艺术”加上“后记”，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三篇幅；这一部分也是译者的专业兴趣所在。“意大利散文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作者以大量的文献归纳出几个基本的结论：14世纪没有为意大利创造出一个共同的书面散文语言，这一任务留给了16世纪。16世纪没有完全废除拉丁文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使用，这一任务留给了19世纪。15世纪没有阻断方言文学的发展，而是在缓慢的进程中明确地向前推进，这个缓慢的进程从14世纪延伸至19世纪，它引导着意大利书面散文语言从托斯卡纳悄然开始，直到今天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民族文明独一无二的语言媒介。意大利语缓慢的兴起也伴随着书面拉丁语同样缓慢地衰落。

在第二篇“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音乐与学术”一文中，作者对文

艺复兴初期音乐的体制——大学中的音乐教席、教堂唱诗班和宫廷里的音乐生活作出了清晰的描述。继而考察了当时两大思想潮流，即人文主义（humanism）和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对音乐的影响，提出音乐在佛罗伦萨学园的创办人和领导人菲奇诺的生活和思想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并指出音乐创作与方言诗歌之间的联系，以及音乐与公共庆典演说的关系。

第三篇“艺术的近代体系”一文约四万多字，是全书所收篇幅最长、也是作者最具纪念碑意义的文章。该文被收入莫里斯·韦茨（Morris Weitz）编辑的第二版《美学问题：文选导读》（*Problems in Aesthetics: An Introductory Book of Reading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该文无脚注的简写本被收在 W. E. 肯尼克（W. E. Kennick）编辑的第二版《艺术与哲学》（*Art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又曾被译成德文刊于《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之二》（*Humanismus und Renaissance II*, Munich, Wilhelm Fink, 1976），译成意大利文登在《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观念及其他论文》（*Concetti rinascimentali dell'uomo e altri saggi*,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78）。该文也被译成中文发表在《美术史与观念史》年刊（II卷，邵宏、李本正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本书译者对作者的了解，也始于1988年范景中教授向译者推荐阅读此文，1997年范先生又催促我译出此文。

作者在该文里认为，尽管人们常常把“艺术”、“美的艺术”或者“Beaus Arts”只等同于视觉艺术，然而它们通常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在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艺术”一词首先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大艺术（major arts）。这五门艺术是近代艺术体系不可分割的核心，但这个有关五门大艺术的体系，起源于比较近的一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还没有明确地定型，尽管它的许多成分可以追溯到古典、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考察提出：到了18世纪上半叶，业余爱好者以及作家、哲学家们对视觉艺术和音乐的兴趣大增。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由外行以及为外行所写的关于艺术的评论文章，同时也出

现了将各门艺术相互比较，将艺术与诗歌作比较的论文，并且最终使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确定下来。由于这个体系似乎是逐渐出现，而且有关的作者虽然有影响但却不算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文章里这个体系又经历了许多变化，因此可将这个关于美的艺术的观念和体系看做是在巴黎和伦敦文化圈中的谈话和讨论中逐步发展和明确下来，而那些正式的文章和论文只是反映了来自那些讨论的观念倾向。

本专题的第四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是作者为本书1990年版增补的。作者认为，修辞学仅仅是由人文主义者所培育的五门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其他四门为语法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而西塞罗（Cicero）的《论创意》（*De inventione*）和托名西塞罗的《献给赫伦尼的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是整个中世纪的基本文献。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修辞学的完整文献通过原文和拉丁文以及方言译本的方式，变得为西方世界所知晓。文艺复兴修辞学尽管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古典和中世纪的前辈们，但它却有着自己的面貌，它也不止以一种方式与其他的四门学科发生联系。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包罗广泛的文艺复兴修辞学史，它必须基于对文献的周密研究，它不仅要描述修辞学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史，它还要描述修辞学理论与实践对文艺复兴文明所有其他领域的影响。

作为本书后记的“‘创造性’与‘传统’”一文，是作者为1990年版增补的第二篇文章。作者在本文中指出：在最近的文学和大众讨论中，“创造性”（creativity）这一术语被频繁使用和误用，但是它的词义含糊不清和定义不当，并且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论证。事实上，原创性（originality）不是艺术作品中的主要因素，并且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主要目标。而传统并不构成与创造性的简单对比，只不过是创造性的倡导者们将传统树立成了假想的手。由于创造性的捍卫者们已经如此激烈地反对传统，便愈加诱惑人们用一种夸大其词去驳斥另一种夸大其词，以及过分强调传

统的价值。作者认为：艺术作品和人类其他行为的杰出性，通常并不是仅仅归功于创造性，而是归功于原创性和传统的结合。创造性会完美地选择运用有价值的传统成分并与之相结合，以产生出杰出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和抽象的思想著作。

借此序文要向中译本读者说明的是：本书第九章的前五节基本依据天津美术学院李本正教授译笔老辣的初稿，因为李教授已经用恰切而准确的汉语表达了原文的意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在此我只能对李教授表达敬意和歉意。此外，译者曾辗转约请广州美术学院的韩艳和胡文慧同学草译第二章的第七节至十八节及第三章全文，还请爱女、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的游智子同学帮我草译了第四、五、六章；虽为草译，我却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吾辈想不到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也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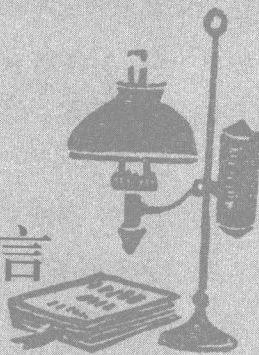
我还要感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耀春老师。未曾谋面的刘耀春老师读过译者的拙译稿和拙著《美术史的观念》中对克里斯特勒理论的阐释之后，遂向出版社力荐本人作为本书的译者；全书译毕，刘耀春老师还不辞辛劳地审校了全译稿，并向译者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同时，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杨美艳女士，她对译者的信任和不断的鼓励才使我有信心最终完成译稿。

我愿将本译著献给我的导师范景中先生，是他最早让我读到克氏的著作，从而使我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是他一直关心着本书的翻译进度且督促我认真地工作，我也在翻译过程中时常与他交流有关译语和原文理解问题；最重要的是，没有他的长期教诲，我可能不会继续对西方艺术思想史有持久的兴趣，由此也就不会有这部译著在“原创性崇拜”的时代里出现。

邵宏

2008年6月8日

1990 版序言



VII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最近已告售罄，为此我要感谢出版社和德博拉·特加登(Deborah Tegarden)小姐，因为他们决定再版此书并增补两篇初版未收入的论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最初发表在詹姆斯·J.墨菲(James J. Murphy)编辑、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雄辩术》(*Renaissance Eloquence*, pp.1-19)。“‘创造性’与‘传统’”一文，发表在已故菲利普·P.威纳(Philip P. Wiener)编辑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3, 44:105-113)。我对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意在此转载第一篇文章表示谢忱，同时我还要感谢《观念史杂志》编辑唐纳德·R.凯利(Donald R. Kelley)教授，他同意在此转载第二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讨论文艺复兴时期思想与文学的关系，适于对本书

第七章关于意大利散文语言的论文作相关补充。尽管修辞学 (rhetoric) 这个术语, 像其他许多术语一样, 最近已变成了巫术似的、极度滥用的词语, 但近年来, 许多学者包括本人仍一直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文化中的重要性。在我看来, 修辞学并非如瓦拉 (Valla) 和他的某些近代追随者所认为的是哲学的替代物, 它实际上是另一种文类和学科; 许久以前, 从我的老师沃纳·耶格 (Werner Jaeger) 和爱德华·诺登 (Eduard Norden) 那里, 我学会了理解这门学科自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的重要意义。

第二篇文章篇幅不长, 收入本书作为附录。与本文集中的其他文章 VIII 相比, 这篇文章较少学术味更多争辩气, 但它仍然关涉既已存在的思想与艺术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 在其他历史时期, 包括我们所处的当代也都存在着这种联系。该文讨论和批评了创造性——这一相当晚近出现的概念, 但是它已经成为当代话语中一个不容怀疑的概念。该文起初是应一家全国性的权威机构之约而作, 后又被约稿者拒绝采用; 这家机构此前曾以“创造性”为主题举办过学术会议。不过, 该文于《观念史杂志》发表前却得到我的几位同事和朋友的称许。后来, 该文被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期刊《猎兔狗》(*Il Veltro*, 1984, 28:17-29)。这段插曲说明一个未被广泛承认的事实: 即, 我们在某时某地享受无政治审查制度的极端自由的同时, 另一种审查制度——基于各种意识形态或服务于时尚女神的审查制度——却针对流行思潮的反对者秘密地运作, 而无视反对意见的合理性或它的事实与逻辑依据。我很高兴有机会让这篇文章与本文集的读者见面。相信该文对时尚观点的讽刺批评, 会被许多持有先入之见的读者嗤之以鼻, 因为文章所诘问的正是这些固有的成见, 但我希望它会受到另一部分读者的欢迎, 尽管可能是小部分的读者。

我不想在此重复1980年版序言里对公众和学术界当下态度所作的评论, 公众和学术界对所有历史研究, 尤其是对思想史研究报有或多或少公开的敌意。我以为, 这种敌意在过去的十年里非但未有舒缓, 反而是变本加厉。基于经过检验的文献学方法, 和对原始文本与文献作详细解

读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研究依据——被贬损和被视作“旧式的 (traditional)”而遭到抛弃。持这种态度的不仅是记者和大众传媒作家，甚至包括学术圈内的一些人物。他们更愿意依据翻译的和二手的材料来写作，他们采用简单化 (reductionist) 的方式方法，这类方法是纯粹玄想的和随意性的，甚或是报道似的 (但被称作是新奇的、优于“旧式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被冠以心理学、新历史主义、社会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理论、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语言学、分析哲学或阐释学之名；他们且时常故作对往日的思想家和作家的思想有新发现，而这些新发现却与那些思想家和作家的原意大相径庭。在最近的一篇文章 (“哲学与哲学史学”，《观念史杂志》[1985,82:618-625]) 里，我称这类方法为“口技法” (ventriloquistic)，我也惊讶地注意到，一位当代的“口技法”从业者一直试图积极曲解这一术语。我还想将这类方法称作“超文本的” (extratextual)，影射时髦的用语“文本性” (textuality) 和“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这些人造术语除了增添一种新奇的气氛之外，不能给熟习的文献研究和影响研究以些微的增益。所有这些方法都不重视文献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而是竭力解读文献里没有的，以及无法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这类研究的倡导者相信，他们通过将现代观念强加给过去从而丰富了历史，但由于忽略和遗忘了绝大部分的传统文献，放弃了以传统文献所能提供的多种观念和见解丰富现代读者的机会，他们因而在事实上使当代和未来趋于枯竭。上述种种又受到一种不置可否的相对主义保护，这一理论宣称，所有的解释同样有效；它完全不顾真实的情形：部分有效，部分不确定或有可能，部分全错，且与已知事实及逻辑话语和一致性原则相反。我所称的“源于无知的证据” (argumentum ex ignorantia) 被大量利用，亦即，幼稚地或有意地漠视已知事实和提出与原作者相悖的观点——这一切之所以热闹地公之于众是出于一个 (正确的) 假设：同样无知的读者和批评家不会明白其中有何不妥。当然，我不希望夸大其词，而且我乐意承认近年里确有不少出色的研究发表，研

究者中既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他们都回避了我所批评的那些流行错误,也未向它们做些许的让步。

我或许年事太高而不能理解或欣赏这些新潮流和它们的宏旨。但我清楚,许多年轻学者赞成我的看法,他们的学术研究受到现代江湖骗子们政治和学术的打压,因此他们不能公开表达对这类方法及其倡导者的看法。因为我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有义务代表众多青年学者和持续的学术传统发言,我希望这一持续的学术传统能在目前种种时尚和愚行中幸存,就如它应对先前的诸多思潮一样。尽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我尚未看到学术传统能够幸存的迹象,但我仍以这一祈愿来结束本文。尤其是,与许多幸灾乐祸的当代灾难预言家不同,我像卡珊德拉(Cassandra)一样,衷心希望我的担忧和预言毫无道理。

我愿将本书献给汉斯·扎雷(Hans Sarre),为了我们终生的、共同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而长存的友谊。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89年9月21日

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1980 版序言



XI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是1965年哈珀火炬丛书 (Harper Torchbook) 初版《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二：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Renaissance Thought II: Papers on Humanism and the Arts*) 的新版，该《论文集》已售罄有一段时间。本书完全不同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及其源流》(*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及其源流》一书，除了新增加的几章之外，还包括了哈珀火炬丛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Renaissance Thought*, 1961) 和《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概念》(*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an*, 1972) 二书里的大部分内容。后者业已绝版；作为哈珀火炬丛书之一的前者，坊间仍见有售。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本书所收的论文又可以与学者、学生和其他有兴趣的读者见面。我意识到，这些论文十五年后仍以当初发表的

形式重印，也许会被某些批评家认作过时。近些年，我从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者的成果中获益良多，我本应将一些细节和参考文献补入文章里。另一方面，自从这些文章发表以来我一直未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且，我必须高兴地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当初所提出的一些像是异端邪说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的。

过去的十五年里，人们的一般态度和舆论氛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使我受到了极度困扰；与1965年那时相比，这种变化使本书及所收的文章愈加不合“时宜”，更不用说这些文章作为单篇论文初次发表是
XII 在1946和1962年间。我依然相信，任何负责的思想史研究都应当基于仔细阅读原文的一手文献；我在本书初版的序言里曾表示过担忧：日益依赖译本和二手材料会把我们带进一个经院式的伪学术（pseudo-learning）时代，现在这种担忧已基本成了事实，而且几乎觉察不出人文学科对此现象有何新的反应。在我们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上出现的，在历史、古典语言和其他外国语研究方面的灾难性滑坡，威胁到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基础，因为这种情形腐蚀了未来学者的训练，并且使普通读者也失去了正确欣赏历史研究成果所需之最基本的知识。

同样严重的情形是：对历史，尤其是对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兴趣日趋减弱，甚至在学术圈里也是如此。对我们时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导致许多具有很大实践和实用需求及前景、而其科学或学术证据却甚为可疑的学科得到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反历史（anti-historical）和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的偏见已渗透到包括哲学、文学和历史学科，然而这些学科曾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基础。哲学家以形式逻辑、语言学和分析哲学为主导，文学理论家以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主导，历史学家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史为主导，由此使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学生们相当被动，并且使他们失去了许多的教席、研究资助和奖学金、出版和学术认可等机会。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少数学者，他们的天才和好奇心未被公众和专业时尚甚或歧视所彻底摧毁。

我们更希望哲学家、尤其是文学理论家们，能够逐步恢复对历史的兴趣，因为他们的原始文献不仅需要哲学的阐释，更需要历史的解读。对真正的历史学家而言，强调政治史的做法同古典文化一样古老，强调经济史的做法是19世纪的遗产，并且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力的影响，强调社会史（这是一个神奇但相当含混的术语）的做法，更多地反映出当代平民主义（populist）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潮流。我并不否认政治和经济史的重要，以及它们对文化和思想史的阐释作用，但 X III
我决不赞成将文化、艺术、思想或哲学的发展完全简化为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因素。这类说法没有哲学或历史学的基础，这类简单化的做法也从来没有成功过。在历史学与在科学中一样，必要原因与充足原因之间有清晰的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容易被具有诸多信仰的历史学家和观念论者置之脑后。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确能够说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某些特征，但决不能说明全部的特征。哲学家、科学家、学者和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不仅受他们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和左右，他们还要受各自专业传统以及个人才能和专业兴趣的影响和左右。现代的思想家或艺术家，无论如何依附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所提供的时尚和机遇，他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原创意义，并且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依附于所属专业以往的传统和昔日的大师。

我们甚至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哲学或其他观念，不仅部分地源于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而且经常反过来影响所处时代及后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从政的政治家和政客，经商的商人和社会改革者，他们都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和信念来行事，而这些想法又来自他们的阅读和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以及最终来自前辈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学者和作家的思想。我们的文明史今天和过去一样，它由很多线索编织而成，要理清这些线索的确是件很困难却又有趣的事情。以为我们的文明及其历史只有某些方面是关键的和值得研究的，这是错误的、应当抛弃的看法。文明的所有方面都值得研究，每一位学者都应当自由地探索那些吸引自